

安顺为通省完善之区。九月初十日臣考试文场甫毕,突潘逆大股由广顺窜逼郡城,知府吕序程稟请暂停武试。臣思该处见有提臣赵德昌驻扎,遽令武场停止未免摇动人心,不得已严谕各学教官廩保等,协同巡查防守。臣一面阅看武场。贼连日攻扑提臣,兵单未能得手。十三日夜四更时,贼乘睡熟,蜂拥爬城,幸守堞人役得力,贼未得逞。适护抚臣派调候补知府毕大锡带队来援,贼遂退窜镇宁一路。^①

黎培敬奔波于贵州各府州县督促恢复科考。“奔走数千里,遍试下游各郡,虽其间历道路之崎岖,经江河之险阻,值兵戈之扰攘”^②,真可谓历尽艰辛、九死一生。黎培敬常常一边组织考试,一边奋勇防御。有时带领武童直接从考场奔赴战场。更有考生为此献出生命。黎培敬硬是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恢复振兴贵州教育与科举考试,不但维系了贵州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命脉,而且为贵州人才培养打下重要基础,为晚清贵州文化之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培敬为激励贵州士子学习,树立人才培养的榜样,编纂了《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和《黔中校士录》,选编优秀士子的制艺作品(八股文、试帖诗)作为范型,供广大生童学习与参考。《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是黎培敬任贵州学政时选取贵阳贵山、正习、正本三书院生童优秀课艺作品编辑刊刻,给书院学习的生童一个制艺范型^③。黎培敬常常亲自到贵阳三书院为生童传授学问、主持考试,其改变贵州教育的愿望十分迫切。《黔中校士录》收录同治四年(1865)贵州乡试录取生员150多人的文章和诗歌作品。黎培敬所选的这些优秀制艺作品的作者,其后大多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充分显示出晚清贵州人才培养的质量。晚清贵州人才发展在同治、光绪时期最为繁荣,这无疑应归功于黎培敬。贵州教育,从同治初年几乎废止的现状,到恢复、发展、繁荣,这是黎培敬主政贵州14年的最大贡献。可以说,黎培敬对推动贵州近

代教育发展立下卓越功勋。黎培敬最敬重的学者是贺长龄,而且最后还因为已故贺长龄恢复名誉而自己受到降职处分。足见其对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折服,其在贵州14年的所作所为,正是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诠释。

注重文教是入黔湘籍官员的共同特点,又如:

邹元吉,字迪仁,湖南靖州人,举人。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兴义府。时郡城兵燹后,文风未振,元吉以兴复文教自任,于是聘积学士主讲文峰书院,设培文局,抽收毫捐助书院膏火,时召诸生至署,亲为讲论,士心翕然。旋以试院毁于兵燹,元吉锐意修复,庀材鳩工,几复旧观,撰联有曰:“遗爱难忘,尝说张公为政;后尘继步,敢云邹鲁多文。”^④

邹元吉任兴义府时,正逢清末贵州大乱之后。面对兵燹后“文风未振”的局面,邹元吉治理措施首先“兴复文教”,其建文峰书院、设培文局,并亲至书院为生童讲授。邹元吉立志继承原兴义府知府张璜重文教的治政传统,欲将兴义打造成如山东邹鲁般文化之乡。这种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对推动清末兴义的文化教育发展作出很大贡献,清末民初贵州乃至全国政治风云人物兴义的刘显世、刘显潜、王文华、袁祖铭以及何应钦的出现可以说直接归功于邹元吉在兴义打下的教育基础。这也是近代湖南经世致用思想在贵州结出的累累硕果。

(四) 推行新政,开创教育新风

光绪后期,朝廷推行新政,这是继戊戌维新变法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的一场社会变革。光绪新政是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后的被迫改革,虽然这场变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刻的,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对推动中国新旧文化转型与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光绪新政在贵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在清末贵州湖南籍官员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

何树荧,号辉廷,湖南郴州优贡,光绪末年任清平。时新政风行,尝捐廉倡

①(清)黎培敬《黎文肃公遗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②(清)黎培敬《黔中校士录》,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2页。

③何建菊,谭梅:《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与晚清贵州的书院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49页。

办师范传习所,又筹款设立巡警教练所,及本城高小学校暨实业讲习所。调查户口,整理烟禁,缉匪清乡,便衣出巡,昼夜不怠,邑中振刷一新。惜在任未半年,丁艰去。士民皆失望,钱行且至数十里,共谓“邑中数十年能任事而得民心如是者,盖亦仅矣。”(《清平册报》)丙午(1906)科优贡,邃于经史学,宣统元年(1909)署任,设立速成师范传习所,提倡教育,不遗余力,划拨公谷七百四十八石,设立本城高初两等小学校;提乡场屠斗捐,创办四乡初等小学校,八寨教育基础于此。^①

何树茨任八寨厅同知,其在任上极力推行新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除了“调查户口,整理烟禁,缉匪清乡”等社会治理外,何树茨最大的政绩就是创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开八寨文化教育新风。其倡办师范传习所,设立巡警教练所,设立高初两等小学和四线初等小学校,办实业讲习所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教育中所没有的新的教育模式与内容,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教育观念。说“八寨教育基础于此”,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故民国《八寨县志稿》说:

到任后即微服到乡间私访人民疾苦,地方利弊无不洞若观火。然后定义兴革,以故诸事悉中肯綮,人民爱而畏之。时创设新政,罢科举,学堂为当务之急。树茨以邑处边隅,风气初开,师资缺乏,即设立速成师范讲习所,择地方绅士之堪为教授者入所讲习。分正副二班,限期毕业,自兼讲员,待学成后乃分向各乡教授。设本城高初两等小学一所,划拨地方公谷柒佰肆拾捌石为修脯暨购书籍置器具之用。又委劝学员到乡间劝设国民小学十余所,人民受其感化,遐迩称扬。未一年,改调清平县,攀留祖道者数十里不绝。今学校逐渐推广,已达二十余所,每念其经营草创之功,辄称颂不置云。^②

在西南僻壤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范围内,却在文化教育方面干出了一番惊人成绩。这对于当时地处偏远、交通信息闭塞的贵州不啻一个教育界奇迹。何树茨从湖南来到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县,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思想、新做法,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与实践,在穷乡僻壤实现了新旧教育的转型,开创了新式教育的新风尚。类似的事例很多,如宁乡人岳衡光绪三十二年(1906)莅普安知县,大力推行新政^③。光绪间长沙人张翰在开州创办新式教育等等^④。这些湖南籍官员能充分意识到改变贵州文化落后的重要性,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推行新政,大力发展地方文教。这也是近代贵州湖南籍官员为政举措的最大共同点。这种文化输入在推动贵州文化发展方面的成效十分显著。

二 入黔湘人的方志编纂及其文化意蕴

晚清时期,贵州史学发达,尤其表现在方志编纂上。在晚清贵州的方志编纂中,入黔湘人参与者众多,或为方志编纂发起者,或为总纂,或为纂修,或为分辑。入黔湘人所编纂的贵州方志水平高、理念新,不但保存和弘扬了贵州地方文化,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志编纂的巨大发展,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保存与弘扬贵州地方文化

方志的编撰,是对一个区域地方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晚清时期,贵州方志编撰活动频繁,成果丰硕。其中道光《遵义府志》《大定府志》《贵阳府志》以及咸丰《兴义府志》《安顺府志》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晚清贵州方志编撰中,湖南籍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道光《贵阳府志》的编纂。周作楫序云: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秋日调署贵阳,中丞贺耦耕先生即以府志见委,谓:“黔中受国朝恩泽二百余年,前此仅有通志。近日山川秀发,人文蔚起,贵阳为通省领袖,志乘缺如,此守土者之责也。尔其修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62页。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3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50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08页。

之!”余曰:“是不易易,非楫之所能为;而先生谆谆之意,似不能已”。于是谋诸在籍之显官绅耆,如漕帅朱荫堂封翁、家石藩、杨兰圃、观察王梦湘、兵部刘心农、司马陈杰峰、刺史孔叙五诸公,皆解囊捐金,踊跃以期于必成。遂延思南萧玉初明府开局于府学明伦堂之右,各秀士任采访者若而人,任誊录者若而人,任杂事者若而人,网罗旧闻,摭摭遗逸,历寒暑而无间,勤铅槧而弗遑。阅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其时,学政胡小蓬先生、方伯李双圃先生、前廉访吴仲云先生皆以为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以辟异说。自“宸章”以至“土司”,列为八十八卷,余编二十卷。条分缕析,体大思精。质之今宫傅见斋先生、前方伯苏溪先生,咸以为有典有则,不懈而及于古,可付剞劂矣^①。

据此可知,道光《贵阳府志》的纂修是由贺长龄提议,周作楫受命而为之。最后的关键修删由湖南宿学邹汉勋完成。道光《贵阳府志》虽然是众人合力完成的方志杰作,但若没有贺长龄之提议,又怎有《贵阳府志》的编纂实施;若没有邹汉勋之“去复删繁”,又怎能使其“以归大雅”“体大思精”“有典有则”呢!可见湖南人在道光《贵阳府志》编纂中的关键作用。另,分纂人之一的邹汉章是邹汉勋的亲弟弟,亦可见新化邹氏兄弟于《贵阳府志》的编纂之功。

邹汉勋是晚清时期湖南著名学者,除删定道光《贵阳府志》外,其在贵州还主纂了道光《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兴义府志》(咸丰四年)、《安顺府志》(咸丰元年),这些方志纂成后均获得较高社会评价,如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巡抚乔用迁评其“搜集之富,体例之精,为足尚已”^②。云贵总督林则徐评其“皆自抒胸臆,不相

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③。贵州学政翁同书评其“是书体裁尽善,庶几常璫之流”^④。咸丰《安顺府志》也获得了著名学者吴式芬等高度评价称赞^⑤。邹汉勋的史学才华,在晚清贵州这个舞台得到充分展现,对中国方志编纂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湖湘文化经世思想在贵州学术文化领域开花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的思想内涵。

又如,光绪《古州厅志》编纂,湖南人参与很多。“鉴定”者中有布政使衔贵东兵备道易佩绅(湖南龙阳人,今汉寿)。“主修”者中有布政使衔贵东兵备道吴自发(湖南镇宁人)、署理贵东兵备道储裕立(湖南靖州人)。“总纂”为古州同知余泽春(湖南武陵人)、“纂修”有户部主事余嵩庆(武陵人)、易顺鼎(龙阳人)、“分辑”中有湖南天门人候补知县徐永熙。此方志编纂与刊布过程较为曲折。光绪古州同知吴厚恩序曰:

光绪丙子丁丑间,武陵余我如太守泽春权篆兹邦,念志乘之未修也,乃慨然检尘牍,稽故籍,询之耆老,证厥见闻,将采辑而编纂之。未几去任,旋以太守需次云南,仍携志稿自随,既成书,寄其门人陆生渐鸿,属陈于官而刊行焉。忽忽十有余年,当事恒谬悠之,无肯为力者,越丁亥十月,余捧檄摄同知事,陆生复陈其书,请如前。余亟读之,瞿然曰“此固守土者之责也,余敢没余君之美而令九仞之山亏于一簣乎!”明年政有间,遂督州人士筹设局,集资付之手民。……此书既成,著农功则知土性种植之所宜;考兵事则知治乱得失之所在;辨疆域则知扼塞险夷之所重;采风俗则知厚薄奢俭之所由;而且验户口之登耗则思所以厚之;别钟夷之生熟则思所以绥之;观人文之盛衰与民性质强弱,则思所以兴起而教育之。自时厥后,良有司精思职业,庶几乎有所取资而州之人共勉于文物声名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2)》,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页。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页。

⑤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页。

之盛,是则不佞与余君之本志也。^①

余泽春在古州任上开始编纂《古州厅志》,书未成时调往云南,其携带书稿去云南赴任,在云南完成编纂,将书稿寄给古州的学生陆渐鸿,嘱其呈给官府刊行。但可惜后任的古州官员并不重视,一拖就是十余年。一个调离贵州的湖南人对整理贵州文化满腔热情,与当时在任的古州官员的漠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亦足见湖南籍人士对保存与弘扬贵州地方文化的贡献。

余泽春,湖南龙阳(汉寿)人,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丁玲的外祖父,其侄孙有著名学者余嘉锡。一起编纂的余嵩庆是他侄儿,余嘉锡之父。而易佩绅、易顺鼎父子也同时参与编纂,一部《古州厅志》竟然有湖南的叔侄、父子同时参与编纂,这也是一件奇事。余泽春、余嵩庆、易佩绅、易顺鼎都是近代湖南著名人物。

再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其编纂者曹昌祺(湖南长沙人),具有独特新颖的史学观,其序曰:

抑昌祺更有进焉:厅当云贵之襟喉,达川、广之声援。自元以来,凡用武者所必争之地。方今互市羁縻,时局一变,英人踞緬,法人踞越,恃其星纬舆地之学、舟车鎗礮之艺,时有狡焉,思逞之心,万一败盟,隐忧实大。是则道里之短长,关隘之险要,山洞之深邃,水道之舒折,亦抚制疆索者,所宜究心也。然则是书成,昌祺以是为守土之程,抑不仅昌祺一人守土之程也,惟顾后之来者,时加蒐辑,勿以废兴听之,则昌祺之所厚幸也。^②

此方志编纂,除了一般方志所具有的宣扬忠孝节义、弘扬地方文化外,又更进一步,即站在国际视野,看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普安的特殊战略地位。普安毗邻云南,西方列强已经占据东南亚的缅甸、越南,与中国亦只有一墙之隔。曹昌祺此序作于光绪己丑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而四年之前光绪十一年(1885),中国已经在广西镇南关大败法国军队。西方列强从西南侵入中国的意

图已经十分明显。事实上,咸同时期,西方宗教势力早已渗入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的教案频繁发生。因此,曹昌祺编纂《普安直隶厅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治理边疆、保卫边疆、防止列强入侵提供重要参考。于此,可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强烈现实意义。

(二)探寻与揭密贵州远古文化

方志编纂,往往需对地方文化考镜源流。贵州方志编纂亦不例外。例如,民国《贵州通志》说:

曹始能《贵州名胜志》云:“贵州所治,殷商之鬼方。”又云:“《宋朝纪要》以鬼方地林多贵竹,因以名州。”此宋人说也。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记》亦谓:“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鬼方之境。”故嘉靖、康熙、乾隆诸《省志》皆云“贵州,殷为鬼方。”《清一统志》、《职方典》并同其说。^③

此将贵州溯源至殷商之“鬼方”,故民国《贵州通志》亦说:“黔在殷代,当为鬼方,故本志托始于殷。”^④“当为”二字,说明民国《贵州通志》编纂者对贵州文化发展上限认识的犹豫。之所以如此,关键还在于缺乏确凿证据。而邹汉勋通过编纂贵州方志,发现了解开贵州远古文化之密码,通过考证,揭示了贵州远古文化发展真貌。这就是邹汉勋关于红崖碑的研究。红崖碑是贵州关岭县的一座摩崖石刻,又称“红涯天书”。一块巨型崖壁上刻有二十多个似图似文的符号,引起了古今中外众多人士的研究兴趣,或以为是殷高宗伐鬼方之纪功碑,或以为诸葛武侯南征纪功碑,或以为建文帝讨伐朱棣檄书,或以为吴三桂藏宝图等等,当前仍然是世界一大文化奇迹和研究热点。

红崖碑图文第一次被载入史册是道光《永宁州志》,在卷首图录里收录“红崖山诸葛碑”^⑤,卷三“古迹”有简要说明:“诸葛碑,在红崖晒甲山悬崖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识。字若朱书,并非镌刻,岩石剥落寸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80页。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4)》,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04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6)》,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28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6)》,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⑤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0)》,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65页。

许,笔画如新,兹将字形摹刻卷首。”^①《永宁州志》关于红崖碑的记载只是简单的客观描述,故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邹汉勋于道光时期编纂《安顺府志》,敏锐地发现了红崖碑的重要史料价值,将红崖碑收入《安顺府志》卷十二《古迹志》中,且将《永宁州志》的“诸葛碑”改称“殷高宗石刻”,将红崖碑历史直溯至殷商时期。并附上《殷高宗刻石释文》^②。这是学界第一次对红崖碑进行系统的文字考释。“考其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刻石。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③邹汉勋通过详实考证,认为贵州实际自殷商时即入中原版图,贵州文化起源甚早,红崖碑就是证据,这是殷高宗征讨贵州的纪功碑。后来之所以无人知晓,这是因为“士大夫咸鄙夷其地,无人搜讨及之”^④。因历史原因,人们以贵州为荒蛮之地,在文化上蔑视之,使得贵州文化的价值不被人们发现。邹汉勋由编纂贵州地方史志,发现了贵州地方文化中的闪光点,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使得藏在大山深处的珠玉得以进入人们视野。邹汉勋的考释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包括阮元、章太炎、刘心源、莫友芝、陈矩、任可澄等均受其影响。任可澄在编纂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一》中还详细列举了邹汉勋的红崖碑释文,以及各家在读了邹汉勋考释后产生的新认识。显然,邹汉勋对贵州红崖碑的研究,使得红崖碑迅速享誉全国乃至海外,吸引了中外一大批爱好者来探秘和深入研究。邹汉勋的研究,不但弘扬了贵州文化,推动了贵州地域文化的研究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贵州文化自信,改变了人们对贵州文化的认识,并对探寻中华上古文明的历史真相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 晚清入黔湘人对贵州开放兼容文化品格形成之影响

不同地域有其不同文化品格。文化品格是某区域的人们在传承与发展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文化品格是一个历

史范畴,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其文化品格也不尽一致。晚清时期,贵州文化繁荣,跃居全国前列,也形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在晚清贵州文化品格的形成中,入黔的湘人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之一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⑤各地有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有些风俗并非利于政教和统治,故历代封建政权极力倡导移风易俗之教化。贵州属少数民族较多地区,历史上的贵州常处在被征讨地位。在建省前“叛服无常”,明代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逐渐接纳中原文化。但土司文化的惯性思维以及相对闭塞的环境,使得这种由文化冲突而演变成的政治冲突在晚清咸同时期重演。湘军援黔,虽然暂时平息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但也同时引发了一些入黔湘人的思考。如:

宝田之抚降苗,责令其先行薙鬢。尝言苗之叛服无常,非独其野性然也,风俗之不一,政教之不及,相激相荡,因而生心。雍正间,苗已大定矣,然雉鬢者十之二、三,盖以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汉民既目为异类,苗亦自居于别种,苗疆所以多故也。欲苗不为乱,必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而要自责令鬢始。盖形貌既同,言语嗜欲,始可更化,数十百年之间,苗民大驯,混同教俗,无所疑阻,则叛戾息矣。^⑥

席宝田在平息咸同贵州社会动乱后引发深深思考,如何才能维持边疆长治久安呢?战争实乃不得已的非常规治边手段,必须强化日常的社会治理。这实际上是席宝田为满清封建统治者治理边省提出的对策。席宝田认为,“苗疆所以多故”,主要问题在于对苗民的化服不够。化服的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0)》,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83页。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3-170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⑤(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3页。

首要之举在于“必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而要自责令鬻鬻始”,也就是说要让苗民的发饰、言语等与汉族相同,只有苗汉形貌相同,则言语嗜好可化,则苗汉风俗趋同,则苗民驯化,自然“叛盗息矣”。与战争的残酷杀戮相较,“化服”无疑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柔性安抚之法。席宝田虽然宣扬的是教化归服思想,但其中不无可取之处。“苗汉同种”,实质上就是将贵州的少数民族列为与汉族同等地位,这是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绝对不能以“异类”“野性”目之,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一切政措才能继续推进。这是边疆治理的基本前提。而“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实际上是加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因历史原因有差异,水平不一致,文明程度有高低,这是正常现象。只有不断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认识、交流,才会消除文化隔阂,防止文化冲突。席宝田虽然站在封建统治立场说话,但从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而言,其对策是有积极意义的。席宝田的对策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治边办法,但要实施这种办法,不但需要长期耐心与坚持,更需要各级官员的开明与善政。这点,在贺长龄、黎培敬等入黔湘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贺长龄治黔9年,将一生主要宦迹奉献于贵州。其推行的正是席宝田所说的“化服”方略。而黎培敬,治黔14年,将贵州从文教断裂的边缘拉了回来。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中,与贺长龄、胡林翼、黎培敬等政绩类似的很多。概括起来,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的为政举措主要表现在维系社会稳定、注重民生发展、加强民风建设、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这些,也正是席宝田所倡导的政治“化服”方式。

欲化服,则必须苗汉同等。欲苗汉文化交融,则必须首先改变观念,打破长期以来贵州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封闭状态。其次,必须输入先进的文化理念与实际的文化内容。据前文可知,这些都在入黔湘人的不懈努力中于晚清的贵州得到了逐步实现。而正因为有这些人黔官员的不懈努力,晚清贵州才形成了一些优秀的文化品格。其中,开放与兼容并蓄无疑是晚清贵州文

化发展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贵州建省前少数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毋庸多说。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曾遭受本族政治势力强烈反对。其后裔安贵荣等曾欲反叛,在王阳明的反复劝诫下才作罢。但其后人奢崇明、安邦彦等还是于明天启年间发动叛乱,演变成了前后持续17年的“奢安之乱”,造成西南边省生灵涂炭,死伤百余万。这充分说明了明代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治与文化之强烈排斥。但,这种文化观念,在清末的安氏后人中就已经不存在了。安家元《奢香夫人献龙场九驿》^①:

开辟功何伟,奢香驿路平。朝天曾奏对,贡道遂由庚。

柔远无烦力,绥戍不用兵。世官宣慰袭,顺德诰封荣。

张据《奢香驿》^②:

谁激诸罗变,贪边诩有功。君王自长策,女子亦英雄。

九驿邮初置,三巴路已通。夜郎今自小,不待问唐蒙。

安家元和张据皆为本土诗人,且安家元还是奢香夫人后裔,称奢香夫人为“英雄”,高度颂扬其通九驿之开辟奇功,显示了大一统思想在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一致认可。这种认识的形成,与苗汉文化交融有关。例如,晚清毕节彝族余氏家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家族一直有文学创作传统,正是因为该家族对汉文化之广泛吸收,才诞生了许多著名诗人。如,余家驹,彝族奢氏后人,从小接受汉学教育,为贡生,其诗集《时园诗草》不但以汉文化诗歌体裁创作,而且其中汉文化内容丰富。仅看一些篇题,如《读史醉占》《读宋史》《宋玉言风有雌雄,戏作贫富二风》《昭君》《武乡侯》《宫词》《演桃花扇剧》等^③,便知其汉文化影响之大。余家驹儿子余珍曾“欲以科名显”,其对汉文化之服膺是显然的,也有诗集《四余诗草》^④,其《读桃花扇传奇》等篇章也表明了对汉文化的接受。余家驹侄儿余昭,从小跟随

①李芳:《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5年,第562页。

②李芳:《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5年,第575页。

③(清)余家驹著,余宏模编注:《时园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④(清)余珍著,余宏模编注:《四余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伯父读书,三赴科场,历官知县、知州、后补知府等,著《大山诗草》,其中对汉文化经、史、子、集征引广泛^①。余昭妻安履贞是彝族著名女诗人,著《圆灵阁集》,^②其中对汉文典籍同样征引较多。族人余达父,不但著诗集,且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担任贵州省立法议员。这些充分显示了开放性与兼容并蓄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晚清时期,一波又一波的湘人入黔,实质就是湘黔文化一次又一次的深层交融。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贺长龄在贵州执政 9 年,用他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经世致用。晚清时期的贵州实际上成为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大实践基地。湘人入黔推动了晚清贵州文化的巨大发展。

On Hunan Persons Entering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N De-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saw the Hunan persons entering Guizhou Province frequently. The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quelling social unrest, maintaining feudal unification, strengthening social governance, reviv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new deal and edit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etc. Guided by the Huxiang culture,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practical use, they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Gui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changed the old ideas of Guizhou and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uizhou culture. I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uizhou's formation of excellent cultural characters, such a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nan person entering Guizhou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alent flow,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nan persons; assistance to Guizhou; thought of practical use; cultural blending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清)余昭,安履贞著:《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②(清)余昭,安履贞著:《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24

近代湘中人才群体构成及其 崛起原因分析^①

黄民文

(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近代湘中英才辈出,既出现了曾国藩、罗泽南一代湘军将帅,又产生了陈天华、蔡锷一代民国功臣;既涌现了宋希濂、廖耀湘等抗日名将,也孕育了蔡和森、彭述之等中共先驱。近代湘中人才之所以能如此异军突起、群星灿烂,原因有三: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二是经世致用与勇于担当的湖湘文化传统,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同辈之间的互相帮衬及湘军一代对后辈的提携培养,为之提供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关键词:湘中;近代人才;构成;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176-09

湘中^①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为晚清湘军主要策源地。曾国藩以降,湘中地区英才辈出,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书写了华丽的篇章。今人对曾国藩、湘军及湖南近代人才的研究已不计其数,而对湘中人才的研究为数甚少。本文拟对近代湘中人才群体的基本状况及其产生原因略作分析,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 近代湘中人才群体的基本构成

近代湘中人才群大致可分为晚清湘军集团人才群、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人才群、国民政府军政人才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四大群体。

(一)晚清湘军集团人才群

湘中近代第一个人才群体是以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刘蓉、刘腾鸿等为核心的晚清湘军集团人才群^②。该人才群主要分布在今双峰荷叶镇、石牛镇,娄底娄星区,涟源杨市镇、荷塘镇等地。

双峰荷叶镇以曾国藩家族为主,曾家不仅有

湘军统帅曾国藩,还有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封疆大吏曾国荃、湘军名将曾国华、著名数学家曾纪鸿等晚清名人。此外,双峰荷叶镇还有难以数计的追随者,他们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因功发迹。双峰石牛镇主要以罗泽南家族为首,罗泽南被称为湘军之母,许多湘军将领都为其弟子。在罗泽南的率领下,罗氏家族许多人也积极参加湘军,如罗镇南、罗信南、罗信东、罗信北等人,这些人都曾经在湘军中建功立业,担任要职。

娄底娄星区主要以刘蓉、杨昌浚为首。刘蓉与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是好友,尤其是罗泽南,与其堪称莫逆之交。刘蓉非常有才华,曾国藩视其为“卧龙”。曾国藩、罗泽南筹建湘军以后,刘蓉任曾国藩幕僚,辅助罗泽南南征北战,颇具功绩,后官至陕西巡抚。杨昌浚为刘蓉同乡好友,1852年随罗泽南练乡勇于长沙,在镇压太平天国中以军功擢升浙江按察使,后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抗法、护台战争中劳苦功高,得以升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清廷要职。在刘蓉、杨昌浚带领

① 收稿日期:2018-10-10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3K11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13JD28)

作者简介:黄民文(1977-),男,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日本立教大学特任研究员,主要从事湖湘历史研究。

①湘中即湖南中部地区,无法进行明确的地理划界,这里主要以今娄底地区及邵阳地区的邵东、隆回、新邵、邵阳县及武冈一部分为限。

②魏源、邓显鹤为湘中近代杰出人才,但当时还没有形成群体,故未将他们视为近代湘中第一代人才群。

下,娄星区许多人加入了湘军,并得以擢升。

涟源则主要以李续宾、刘腾鸿两大家族为重。李续宾系涟源荷塘人,亦为罗泽南得意门生,1852年协助罗泽南办团练后开始军旅生涯。在李续宾的带领下,涟源李氏族人普遍加入湘军,多人以战功升迁,其中,《清史稿》立传者有李续宾、李续宜、李光久三人,至于知府、千总等不计其数。刘腾鸿,今涟源杨市人,1853年始带领族人参加湘军,以军功升任直隶知州。刘腾鸿家族中涌现的湘军名将刘腾鹤、刘连捷、刘岳昭、刘岳昀、刘岳畅等人,至于其他营哨等则不可胜数^①。

湘中湘军集团人才群以曾国藩为核心,以刘蓉、刘腾鹤、罗泽南及罗氏弟子李续宾、杨昌浚等为骨干,彼此以师友、姻亲为纽带相联结,共同战斗、互相帮扶,从而形成晚清湘中首个人才群。

(二)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人才群

近代湘中第二个人才群体是以陈天华、谭人凤、蔡锷、李燮和、禹之谟等为核心的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人才群。这一人才群体主要分布在今新化及隆回、新邵、涟源双峰、邵阳市等地。

新化以陈天华为代表。陈天华,新化荣华人,少年时即具反清思想,1897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后因家庭变故,返回家乡另一新式学堂——新化实验学堂学习,1903年受新化实验学堂资助留日,在日本与黄兴组织抗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与杨笃生办《新湖南》《游学译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政治学说,宣传民主革命,鼓吹民族独立。1904年陈天华与黄兴、宋教仁发起成立华兴会,1905年又力主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组建同盟会。陈天华还曾任《民报》编辑,参与对康、梁保皇派的论战,著有《警世钟》《猛回头》,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陈天华的影响,新化许多人加入同盟会。据《新化县志》所载,出席同盟会成立大会的各省代表约百人,而新化籍代表就有三十多人。

隆回以谭人凤、邹永成为代表。谭人凤,隆回鸭田人(前属新化),1876年入洪门,开始从事反清斗争,1895年开山堂,成为会党首领,1905年组织宝庆反清起义,1906年去日本,在黄兴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并成为重要骨干。谭人凤一生曾策应萍、浏、醴起义,参加镇南关起义,谋划广州新军

起义及武昌首义。在谭人凤的影响下,周叔川、曾杰、谢介僧、谭二式(谭人凤子)等许多杰出之士加入了反清革命的行列。邹永成,隆回罗洪人(前属新化),1904年参加华兴会,1911年与谭人凤组建中部同盟会,谋划响应黄花岗起义,后与焦达峰、孙武策划两湖起义,武昌起义后与谢介僧、谭二式成功发动宝庆、新化起义。邹永成一生与宋教仁来往密切,宋教仁遇害后,邹永成即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后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在邹永成的推动下邹氏家族邹元和、邹鹏振等许多人加入了辛亥革命的队伍。

邵阳市区辛亥革命人才群以蔡锷为中心。蔡锷,邵阳市郊区人,早年就读长沙时务学堂,颇受梁启超器重,曾积极参与谭嗣同、唐才常组织的南学会,维新变法后应梁启超之邀去日本,在日本学习政治、哲学、军事等,回国后先后在广西、云南任新军总教练、协统等职。1911年蔡锷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后任云南都督。袁世凯称帝以后,蔡锷以带病之身,为四万万万人争人格,首义于云南。在蔡锷的影响和带领下,戴哲文、苏鹏、曾广轼、石陶钧、雷飙、戴岳、何鹏翔、朱云安、刘达武、萧堃等一大批有志之士加入反清、反袁革命的行列。

涟源以李燮和为中心。李燮和,涟源蓝田人,1900年就读于长沙求实书院,在此接触维新思想及反清言论。为推翻旧社会,李于1904年创立黄汉会(该会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后加入华兴会并成为骨干。1905年李燮和为响应黄兴长沙起义与谭人凤(会党)密谋宝庆起义。1906年李燮和赴上海,在上海结识章太炎、陶成章等,与陶成章结为莫逆,并加入光复会。在反清革命中,李一身入四会,六任总司令。其弟李云龙、同乡李任、双峰籍清军军官黄汉湘、革命志士李海、张斗枢、周来苏、邹序彬等许多人都是其反清革命的追随者。

双峰以禹之谟为中心。禹之谟,双峰青树坪人,出身湘军,1895年在长沙结识唐才常、谭嗣同、毕永年等,戊戌变法前夕与哥老会首领毕永年在醴陵、浏阳进行维新活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遂力倡革命救亡。1900年禹之谟负责自立会汉口起义的枪弹运输工作,起义失败后赴日本

^①李藻华:《娄底湘军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276页。

考察变法图强实际。1904年禹之谟参加黄兴、刘道一、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1905年任同盟会湖南第一任会长,曾领导长沙工商学各界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成为长沙群众运动的革命领袖人物。在其引导下,陈荆、陈松藤、邓介松、刘运龙、欧阳任等众多人积极参加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湘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才群体多留学日本,多为同盟会会员,也有一部分人来自会党和旧湘军,如谭人凤、禹之谟等。这些人受维新思想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大,反对满清王朝、主张民族民主革命。

(三) 国民政府军政人才群

近代湘中第三个人才群体为国民政府军政人才群。他们以方鼎英、宋希濂、廖耀湘等为核心。

方鼎英系新化圳上人,1899年入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期间产生学习军事带兵革命、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1902年由赵尔巽选拔留日,在日本结识陈天华、孙中山,由陈天华介绍入同盟会,1925年经谭延闿推荐任黄埔入伍生部部长,1926年任教育长、代校长。在方鼎英的带动和支持下,湘中地区许多人进入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据统计,湘中地区先后在黄埔军校任教的有高霁、唐星、成仿吾等28人^①。高霁还曾继方鼎英之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湘中地区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更多,黄埔一期全国共招收470人^②,其中新化县籍就有28人^③,从第一期到第六期(1924~1927年),仅今娄底地区共有206人入读黄埔军校。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近代反对军阀、抵抗外辱的中坚力量。如袁朴、廖耀湘、李文、萧赞育、袁国平、宋希濂、刘建章、谢冰莹等均出自黄埔,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宋希濂为双峰杏子铺人,7岁入娄底陶龛学校接受血性教育,1921年入长沙长郡中学读书,1924年入黄埔一期,与陈赓同窗,并由陈赓介绍秘密入党。在读期间,宋因东征有功相继升任排长、连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退党追随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在滇西北反击战中功勋卓著。在宋希濂的影响下,其兄宋宜山、宋仁楚也先后入读黄埔。在宋希濂的带动下,湘中许多人随其投身于北伐或抗战,如廖觉雄、梁竞魂等都先后追随其

抗战,并建功立勋。

廖耀湘,邵阳县北乡(今新邵酿溪镇)人,黄埔六期毕业,因成绩优异保送法国留学,1932年与黄兴侄女黄伯溶结婚,1936年回国后历任教导队少校连长、中校参谋主任、200师少将参谋长、22师师长、新6军军长、9兵团司令等职。湘中地区也有不少人受廖耀湘影响和提携。譬如其同乡李涛,抗战期间李涛始终追随廖抗战,并受廖提携历任其部22师营长、团长、旅参谋长、旅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升任新6军军长,李涛接任22师师长,廖耀湘升任9集团军司令,李涛又接任新6军军长。

湘中民国政府军界人才群体中许多人来自于黄埔军校,这与方鼎英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教育长不无关系,因此方鼎英可视为此一人才群体之首。

(四) 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

近代湘中第四个人才群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他们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广,涵盖今娄底与邵阳两地区。

娄底以蔡和森、蔡畅为骨干。蔡和森,双峰永丰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1913年考入湖南一师,曾与毛泽东等人一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经常通过信函与毛泽东、陈独秀讨论建党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并首次提出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1921年底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历任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在蔡和森的带动下,蔡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蔡母葛健豪年近五旬还随蔡和森、蔡畅赴法国勤工俭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中国“惊人的妇人”。胞兄蔡麓仙亦经蔡和森介绍入党,参加革命,曾任罗章龙秘书。蔡麓仙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纠察队,英勇牺牲。妹妹蔡畅深受蔡和森影响,从小跟随其在长沙、法国等地学习,并在法国入党,成为20世纪初活跃的女革命

^①新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新化文史(第五辑)》,内部发行1995年版,第100-103页。

^②李明:《黄埔军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③新化县志编纂委员会:《新化县志》,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8页。

家,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受蔡和森的影响,娄底地区许多人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他们中较著名的有李中、王则鸣等人。李中,双峰县石牛镇人,与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一师,在蔡和森的影响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协助毛泽东建立学友会、办夜校,后赴上海工作,受到陈独秀接见,并通过陈独秀结识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启汉等人,很快成为初具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1920年协助陈独秀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及上海机器工会,后经陈独秀介绍入党,成为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王则鸣,双峰县印塘人,17岁考入湘乡驻省中学,由蔡和森介绍结识毛泽东、彭璜等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王则明积极投入驱张运动及五四爱国游行,并于1919年由毛泽东发展成为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则明1921年入党,1922年受组织派遣与蒋先云一道赴安源煤矿协助李立三、刘少奇开展工运,领导罢工,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杀害。

娄底地区无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中许多人是在长沙读书期间接触了新文化,受新文化的影响而寻求变革社会、救国救民真理的,带领他们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是蔡和森等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①。

邵阳地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在北京、长沙等地读书时也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在北京读书的学生以彭述之、匡互生、谢伯俞、张炯等为代表。

彭述之,隆回人,1921年入党,1924年与李大同参加共产国际五次大会,曾任中共旅苏支部书记,1925年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匡互生,邵东人,早年在北高师专攻天文学,1919年与傅斯年、段锡朋等组织五四爱国游行运动,并亲手点燃火烧赵家楼的火种,回湖南后曾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与毛泽东一起成立了文化书社。谢伯俞,邵东人,1924年入党,受李大钊器重,协助李大钊工作,1927年与李大同一同被捕遇害。受李大钊、

谢伯俞影响,张炯、伍芝等在京读书的邵阳同乡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邵阳籍在长沙读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们以匡非非、王湖、戴天为代表。匡非非,绥宁人,1914年考入湖南一师,是毛泽东同学,曾加入毛泽东组织的“学友会”,毕业后回乡宣传新思想,1925年协助郭亮开展农会活动,1928年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回乡组织武装革命,同年遇害。王湖,1918年考入湖南一师,受五四运动的洗礼,1923年加入共产党,后回家乡开展农运,1927年遇害。戴天,邵阳市区人,1919年考入湖南一师,在此结识郭亮、夏曦等同学,受马列主义熏陶,也成为学生运动活跃分子,1926年入党,后回家乡组织工运,马日事变时遇害。除上述人员以外,湖南一师邵阳籍人士还有彭钟泽、邓中宇、欧阳东、邓成云、戴伟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湘中地区不仅有许多早期的中共领袖及青年骨干,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如红军独立一师政委李萼、红五军“能干的青年司令员”贺国中、红五军大队长吴迪芬、红十军参谋长曹昂山、红八军参谋长宛旦平、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彭杨军事学校副校长李林、二野名将匡斌、开国上将李聚奎、国共两党双料将军白天、铁道兵副司令李寿轩等,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近代湘中人才群体崛起的原因

人才群体的产生往往与历史时代的需求、人才群体的文化性格、人才之间的相互帮衬紧密相关,近代湘中人才群体的异军突起,也离不开以上因素。

(一) 近代湘中人才群体产生的历史机缘

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结构往往固化,社会阶层变化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只有在社会急剧变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才可能有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毅力、智慧和勇气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此即所谓时代造英雄。湘中近代人才群异军突起、英才辈出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

^①周立志,周锦涛:《早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变化和转型的产物。

首先,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近代湘军人才群。湘中近代以前,虽然也有一些历史名人,如三国宰相蒋琬、南宋神童贺德英、监察御史唐凤仪等,但数千年以来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近代以来曾国藩湘军一代便将帅成群、不计其数。究其根本,还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后,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清朝的正规军根本无力抵抗,在此岌岌可危之际,曾国藩筹办的地方团练小试锋芒却力挽狂澜,从此这支以湘中人曾国藩为核心的地方武装——湘军,成为晚清王朝不得不倚靠的重要支柱。在后续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得以发展壮大,人数达数十万,由此而产生近代湘中湘军集团人才群体。其中,不仅有曾国藩、曾国荃、刘长佑等总督,也有李续宾、李续宜、江中源等巡抚,更有数以百计的湘军名将,可谓将帅成群、群星灿烂。

其次,清末留日学潮催生了近代湘中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甲午之战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更为严重,不得不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维新的内容之一便是派人出国留学。由于当时日本政府乐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在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推动下,1900年前后国内兴起留日学潮。湖南在当时是比较开风气的省份,留日的学生较多。其中,湘中各地去日本留学者也为数不少,如蔡锷、陈天华、戴哲文、方鼎英、曾继梧、杨源浚、张斗枢、邹序彬、邓介松、谭人凤、伍任钧、曾杰等人先后东游日本。他们看到日本学习西方而变得强大,便对祖国的羸弱倍感痛惜,对封建制度及清王朝的统治深恶痛绝,原来反清的更加反清了,原来不反清的也开始反清了。于是他们翻译新书籍、宣传新思想,成立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爱国组织,并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等反清团体,回国后他们便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再次,辛亥革命及反袁斗争造就了湘中近代民国政府的开国元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湘中革命党人加入反清革命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了丰功伟绩。其中,谭人凤在湖北军政府内部紊乱、大敌压境的紧迫形势下,草拟条例、整合机构、稳定政权,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黄兴、黎元洪先后离汉,武昌无主的危急关头又挺身而出节制各军稳定时局,为巩固首义成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李燮

和在武昌起义后率领队伍反正吴淞、光复上海、攻取南京,并节制各部援鄂北伐,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可谓厥功至伟。蔡锷在武昌首义后于云南遥相呼应,宣布独立,在袁世凯逆行倒施、称帝为皇后又以带病之身在云南首起发难,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为反袁斗争立下首功。当然,湘中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仅仅只有他们三人,还有更多的湘中子弟追随、支持他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浴血奋战、建功立业,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又次,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及全民族抗日战争成长了近代湘中的军事将领。袁世凯倒台后各个军阀又随即作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在全国分割统治。革命尚未成功,国人不得继续努力。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革命力量的积蓄,1924~192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在这场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中许多近代湘中人脱颖而出,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方鼎英、杨源浚、邹鹏振、戴岳、廖湘芸等。方鼎英在这一时期历任北伐特遣军总指挥、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教育长、代校长。杨源浚1925年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师中将师长。邹鹏振1927年任第44军副军长。戴岳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师长。廖湘芸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要塞司令兼桂军2师师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20师中将师长。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机,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湘中地区也成长起来一批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中,国民党将领有宋希濂、廖耀湘、邹鹏奇、刘建章、潘鉴、李涛、袁朴、王卓凡、萧庆鑫、梁祇六等,共产党将领有罗云、匡斌、姜齐贤、陈正湘等。

最后,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了湘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1915年,中国大地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潮流中,湘中人肩负历史的使命,奋不顾身,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如蔡和森率先与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并在与毛泽东等人讨论建党的过程中最早提出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匡互生走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最前列,义愤填膺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火种;谢伯俞作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信仰坚定,不

畏牺牲,22岁时与李大同一道英勇就义^①;贺民范在五四运动后不惧艰险,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培养进步青年,推荐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参加俄罗斯研究会,支持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及湖南自修大学以培养工农革命骨干^②;李抱一主持湖南《大公报》不畏强权,反对袁世凯,驱逐张敬尧,揭露赵恒惕,推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彭述之1919年在北大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成为我党早期党员,此后积极支持陈独秀的工作,曾历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和第四届中央局委员。

(二) 湘中近代人才群体产生的文化性格因素

虽说时势造英雄,但在同样的历史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英雄。要成为英雄,还必须具备符合当时时代需求、促进历史进步的优秀文化性格。近代中国频频遭受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流。在这样的历史时代,需要一些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意志坚强的人来挑起历史的重任,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近代湘中人才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文化性格。

其一,他们继承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湘中位于湖南中部,具备典型的湖湘文化基因,而湖湘文化的重要传统便是经世致用。近代湘中人充分继承了这种传统。以湘军将帅为例,曾国藩5岁随父读书,青年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后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倭仁钻研朱程,以理学为皈依。但曾国藩并不是单纯的研究理学,而是把“理义之学和经世之学有机地融合了起来,用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实践中,以‘经术’为治术,成功地把传统的经世之学与学习西方、举办洋务结合起来”^③。又如罗泽南,罗出身耕读之家,自幼随叔父学习《四书集注》《左传》等,后亦钻研

理学,并“自觉地将理学与经世之学有机地统一起来,以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④。曾、罗二人创建湘军,匡扶晚清王朝,正是他们理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杰作。

其二,他们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心忧天下是中国士子的传统,古往今来,中华大地忧国忧民者比比皆是,但这种家国情怀在近代湘中人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曾国藩担忧太平天国后“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忧大清之变、孔孟之痛^⑤,罗泽南临终前仍然“忧世难忘天下事”^⑥,希望天下能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⑦。虽然曾、罗等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心忧的天下只是大清王朝的天下,只是理学道统的天下,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湘中人心忧天下的思想不断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陈天华到26岁大龄,坚持“国不安,吾不娶”^⑧,蔡和森、蔡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中人心忧天下的典型。

其三,他们发扬了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质。敢为人先是湖南人的另一重要特征,湖南到处不乏此优秀品格之人。道州人周敦颐开创宋明理学,衡阳人王夫之创立船山学说,邵阳人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湘中人充分发扬了这种敢为人先的优秀品格。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并且首次上奏清廷派人出国留学;蔡锷率先在云南一隅以数千志士起兵反袁;蔡和森与毛泽东一道建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蔡母葛健豪年近五十还携全家赴法勤工俭学,成为当时“中国女界之创举”^⑨。

其四,他们弘扬了敢于斗争、不畏生死的精神。敢于斗争、不惧生死也是湖南人的文化传统之一,数千年以来湖南此类英雄不胜枚举。而湘中人在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则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近乎血性。陈天华在异国他乡成立了

①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邵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②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邵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339页。

③刘志靖,王继平:《曾国藩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

④谢世诚:《罗泽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⑤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4 修订版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0页。

⑥罗泽南:《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页。

⑦刘铁铭:《湘军与湘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89页。

⑧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遗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9页。

⑨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